

## (反)全球化下的傳播研究： Mead、Bakhtin、Wittgenstein

方孝謙\*

### 《摘要》

以 Mead、Bakhtin 有關傳播的理念，建構出合乎主流實證主義的理論模型之後，筆者認為主流的模型當然還有提供概念、指導研究的作用。但是屆此(反)全球化時代的到臨，我們也許更應該秉持 Wittgenstein 「家族相似性」概念的精神，開拓所謂「想像的傳播探索」。想像的發揮要從常識上大相逕庭的事物中看出它們的類似關係，這跟實證主義理論所依仗的理性——從事物在時間點的接續順序中找出因果關係的思維——是分別極大的思考方式。在把想像、理性及它們與語言的關係一一釐清之後，我們以兩個實例說明依「想像的傳播探索」所做的結果如何。

關鍵詞：姿勢、內在話語、家族相似性、接近性、類似性

以「家族相似性」用於「想像的傳播探索」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E-mail: scfan@nccu.edu.tw

有意識的傳播...產生於姿勢轉為符號的當兒，也就是當姿勢開始帶給做姿勢的人及對所看到姿勢做回應的人固定意義的時候。而所謂固定的意義是從做姿勢的人後續〔在回應的人之後〕的行為中看出。

—Mead (1934:69)

話語是說話的人互動的產物，也是話所由生的各種複雜的社會情境的產物。

—Voloshinov (1973:79)

想像一種語言就是想像一種生活。...〔而〕說話就是這種生活的一部分。

—Wittgenstein (1958:8 & 11)

## 壹、緣起

今年二月，當為全球化背書的世界經濟論壇（在紐約舉行）與反全球化的世界社會論壇（巴西）在南北半球隔空對峙時，我有泰國之行。在飛機上看到小男孩的T-恤有兩行字：中文是「台灣小歐洲」，英文是「a piece of Europe in Taiwan」。我端詳他的一家四口半天，才恍然他可能是台歐混血，而「台灣小歐洲」意謂「在台歐人（第二代）」。

前一句的地理名詞指稱的是後一句的「人種」，在下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隱喻」（metaphor）的作用。而隱喻作用也正是本文所主張的，傳播乃至社會科學的研究應從「理性的模型否認」過渡到「想像的意義探索」的關鍵。

上引三位在傳播學門之外的學者都沒有把語言抽離使用語言的社群來看待，所以可以說他們都是在處理傳播——人與人之間以語言符號互相理解的過程。但是他們處理的手法各異：Mead的傳播理論最完整、分析互相理解的機制最具體，可是細節上的疏漏也最多；Voloshinov（一說是 Bakhtin，以下統以 Bakhtin 稱之）的理論體系複雜但不完整，卻

足以補 Mead 的不足——他看出溝通包括「外在」與「內在」語言的運用；Wittgenstein 的說法博大精深卻是反體系化的——他要求我們正視語言之為用實建立在字詞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上；而在我看來他是視傳播為「隱喻」的關係，因此是發展「想像的意義探索」的重要人物。以三人學說建構(用 Mead、Bakhtin 理論)並同時解構(用 Wittgenstein 說法)傳播之為物的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當下的研究情境乃是廿一世紀初的(反)全球化脈絡，所以本文最後想要探討三人的傳播觀點與全球化的可能關係，也就是要落實本文從印證「理性的傳播理論」的研究風格，轉到發揮想像力以探索傳播意義的主張。

## 貳、一個可能的理性傳播理論

Mead 認為社會秩序繫於傳播之為用。而傳播等於是「社會行為之結構」的動態面，表現在三組相連的關係上：A 做出某一姿勢；B 對此一姿勢有所回應；A 完成她所肇始的社會行為(含內化了 B 回應她的態度)。所以社會行為結構的存在以符具(signifier)的轉變(從「姿勢」化為「重要符號」)及相同態度的採用為關鍵，其中重要符號(significant symbol)的出現，意謂在 A、B 碰面的情境中，符具已經從傳播層次較低的姿勢蛻變為對 A、B 具「同等效果」(1934:42)的符號。<sup>(1)</sup>由此可見，Mead 的傳播理論屬於對社會結構的微觀分析，但是 A、B 二人的三組關係如何擴連成鉅觀的「社會」；及這樣的社會有無內在衝突等問題，Mead 並沒有交待。尤有甚者，「內化態度」的過程與符具之間的關係他並沒有剖析。凡此缺點就有待 Bakhtin 對階級的看法及其「內在話語」(inner speech)觀念的補強。

在 Bakhtin 早期的著作中，他深受馬克思「上/下層結構」分析範式的影響，所以屢從「符號/存有」的層化關係來分析傳播。簡言之，個體的生存決定了她的符號類型(genre)與主題(theme)；而符號則在它的變遷過程中反映並折射(refract，所以符號有其自主空間)存有的

實況——尤其是階級鬥爭的實況。人的話語就是意識形態、或稱意理的表現，所以充斥個人行為的內在與外在話語可以總稱為「行為意理」(behavioral ideology; Voloshinov, 1976:88)。承平時代下層結構決定的行為意理穩固強健，所以官方與平民的意識幾無差距；而一旦階級鬥爭嚴重，這一差距就會拉大加深，內在話語外在化的動機也會遭到官方壓制：內在語言就無法清晰嚴謹的述說出來。因為對階級鬥爭的認識，Bakhtin 認為傳播會在心靈深處受階級處境的桎梏，社會也會因這種桎梏而持續分裂；他是徹底與 Mead 的社會和諧論決裂的。

Bakhtin 對傳播理論的貢獻尤其表現在對內在話語的分析上。他認為構成內在話語的單位就像「對話中你來我往的句子」(1994:57)，所以要了解內在話語的類型可以從確認對話的類型著手。而 Bakhtin 對話類型的研究中與學者最有關係(因為我們經常在引用人家的話)又前後繁複多變的，就是對「引話」(reported speech) --A 的話中引用到 B 的話——三大類型的探討。

第一類為直接論述(1994:110)。意指 A 始終保持語意上的權威，對 B 的話完全以自己的詞彙改寫。

第二類為客體化(objectified)論述(1994:105-110)。即 A 的話中直接引用 B 的話，所以論述中有「作者(A)的話」與「角色(B)的話」兩種。這種論述在風格上有兩種傾向：直線式的風格—A 只是單純要理解 B 話中的意思；及繪畫式的風格—A 對 B 的話夾評夾敘，對它又是臧否又是反駁。

最後一類為雙聲並存(double-voiced)的論述(1994:106)。又分為單向的論述(如說書人的故事中，任何 B 的話只是帶向故事涵意的手段)，多向的論述(如冷嘲熱諷的引用 B 的話，極易分解成兩個「直接論述」)，和主動的論述(如對話中的第二次答辯(rejoinder)，相對於前二論述乃被動的，這一論述則是在 A 話的範圍之內不見 B 話蹤影，但 A 的話又無時不考慮、觀照到 B 的話)。

所以 Bakhtin 內在話語的觀念，就是一人在心中分飾 A、B 二角，

而有三種不同的自說自話方式。以 Bakhtin 的觀念補強 Mead 的傳播理論及修正後者對社會總處於和諧狀態的看法，我們就得到另一個與傳統的、實證主義的傳播模型無分軒輊的理論。<sup>(2)</sup>在這一理論典範下做研究，我們總是在追求經驗資料能夠支持或否認理論的宣稱，讓我們稱這一類型為「理性的傳播理論」。這一類型是與以 Wittgenstein 做代表的「想像的傳播探索」大相逕庭的。讓我們先介紹 Wittgenstein 對語言的看法，特別是他的「家族相似性」觀念後，再申論這兩類傳播典範的差異在全球化的今日，對我們做研究的啓示。

### 參、想像的傳播探索

早期與晚期的 Wittgenstein 對語言看法的重大差異之一，在他的權威註釋者看來，就是從「視命題 (proposition) 為真實的模型」(Baker and Hacker, 1980:499) 到「視命題為一具家族相似性的觀念」(1980:497) 的差別。早期的 Wittgenstein 與上述的 Mead 與 Bakhtin 一樣，把理論語言 (如 Mead 的「社會行為之結構」或 Bakhtin 的「引語類型」)，視為分析真實的工具。這種語言的用途，最終是透過經驗資料的否證而以「法則」的型式理解並進而控制真實。但是到了書寫《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時候的 Wittgenstein，則大力提倡要了解一句話的意義就是要知道這句話是怎麼用的；因為同一句話的用法有多種，它就有多種具家族相似性的意義，而要掌握同一句話的多種意義，就等於要了解那一句話所從出的生活的全部。晚期的 Wittgenstein 從雲端的哲學家身分降為傾聽凡人說話的學生，並以他後來所學做為去除哲學體系的診療工具 (Rorty, 1979:5)。

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 Wittgenstein 對「家族相似性」的用法。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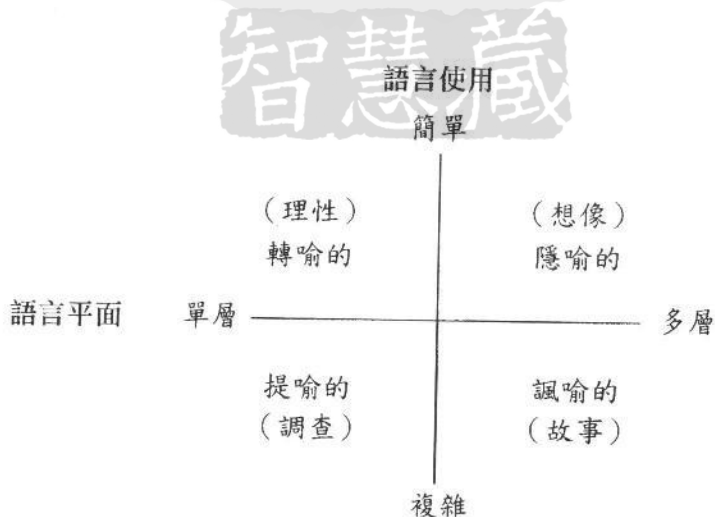
考查〔各種遊戲的〕結果顯示：我們看到由縱橫交錯的相似性聚成的複雜網絡；有的是整體相似，有的卻是細節相

似。

我想得出最好的說法，是形容它們具有「家族相似性」。因為家族成員間具有各方面的相似：體型、五官、眼珠顏色、步態、氣質等等等等，都縱橫交錯在一起。我因此說：所有的遊戲也形成一個家族。(1958:32)

「家族」跟「遊戲」是 Wittgenstein 所引的兩個例子以說明相似性的縱橫交錯分布；它們也是兩個語言範疇而從中可以發展出談論「家族」與「遊戲」的種種字彙、語句。語言學者稱這樣一種範疇及其衍生的相關字彙與語句為一個「語言平面」(linguistic plane)。借助「語言平面」的觀念，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 Wittgenstein 的「相似性」以及他對語言從「模型」到「家族相似性」的認知轉變如下。

讓我們把語言表達分為語言使用(含人類成長過程中自簡單到複雜的使用能力)及語言平面(含聚焦討論問題的單一平面到放射討論的多層平面)兩軸。以上概念就可組合成以下關係：



圖一：以語言使用及語言平面分類的四種比喻

隱喻關係 (metaphoric relation)：就像童言「月亮的青春痘〔月表坑洞〕好醜」中，有關「星球」的語言平面被拿來與「生理現象」的語言平面交織，並被賦予美學判斷。隱喻關係是用到兩層語言平面的「相似性」(而所以相似則源自說話者的想像)的最簡比喻。本文開始所引的「台灣小歐洲」也屬於這種最簡單的隱喻。

諷喻關係 (ironic relation)：是隱喻關係在語言使用上的複雜化，如社會學者季登斯有名的諷喻：「在社會科學的火車站等待愛因斯坦的列車到來的人，不但等不到這班車，她根本就等錯了車站。」這裡至少牽涉到「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運輸工具」三個語言平面。

轉喻關係 (metonymic relation)：如「中南海的命令」指中共高層的決定。因為中共高層與中南海在地理(同一語言平面上)的「接近性」(他們都住在中南海)，所以二者可以互換而意義不變。

提喻關係 (synecdochic relation)：同一語言平面上不但接近而且蘊含大/小或全體/部分關係的二詞，享有此提喻關係，即可以以小喻大或以部分喻全體。調查研究就是以「母體」、「樣本」的統計語言表現此一關係。事實上也有人主張說故事也表現此一以小喻大的關係，但我認為從說故事的人都希望聽的人得到她的故事「意在言外」的「教訓」(morals)來說，故事更接近反諷的運用。

圖一還有「想像」及「理性」兩個括號還未解釋。我們認為想像力在語言表達上的發揮，就是能夠從不同的語言平面中，看出類似(similarity)的關係：涉及的語言平面數愈少(最少為兩個)，想像力愈呈隱喻式的表現；涉及的語言平面數愈多，則愈呈諷喻式的表現。Wittgenstein 從「家族」與「遊戲」兩個語言平面中，看出「家族相似性」觀念的存在，自然是他發揮想像力的結果。另一方面，理性的發揮則是在同一語言平面上依字彙、語句在文法上的「接近性」(contiguity)鋪演出真實世界的理論倒影，也就是世界的「模型」。此一模型愈簡單，它與真實之間愈接近「轉喻」一簡單替換一的關係；而當理性被高度發揮，譬如說產生了複雜的統計語言時，那麼社會科學者在從事調查研究

(survey) 的時候，就可以「母體」、「樣本」的字彙表現模型與真實之間「以小喻大」的關係，我們特別稱為「提喻」的關係。從我們的解說來看，前後期 Wittgenstein 對語言認知的改變，基本上是在人類心靈的理性力量之外，轉而強調想像力的重要性；後者以「異中識同」的方式，使人類的語言得以在不同平面上跳躍卻達成溝通的效果，就像在「哈利波特」的故事中，閱聽人都體會到小魔法師們友誼的可貴一樣。

## 肆、兩個例子

如果我們的解說合理，則傳播學門之外的三位學者對傳播的看法，顯然是二分為「理性的傳播理論」(Mead、Bakhtin) 及「想像的傳播探索」(Wittgenstein) 兩類，這對我們思考全球化情況下的傳播研究，有什麼啟示？

首先，我們應知「印刷資本主義」的盛行已為廿世紀上半的殖民地世界創造了「想像的社群」—Anderson (1993) 的書名指的是殖民地興起的新民族國家。但是印刷資本主義也大大的提高了普遍受教育人們的想像力。隨著廿世紀下半傳播科技的突飛猛進，人們的想像力更被激發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因此我們現在有全球性的哈利波特社群、或樂透獎「墓仔埔」的明牌社群）。可以說從平面到電子的傳播技術在廿世紀的發展，是使得人的想像力能夠無限上綱的重要因素。如今再加上 Wittgenstein 指點的「想像的傳播探索」，在（反）全球化十四年（從 1989 年「蘇東波」事件算起）的今天，傳播研究的走向的確應該在傳統的「理性的傳播理論」之外，大力開發想像的層面。可是如何做呢？我權且舉二例說明從隱喻到諷喻的想像探索何所指。首先，人類學者 Appadurai (1996) 在分析全球化下的「想像的世界」（他指的是五光十色的影像 (images)，加上拉崗精神分析學中的「想像界」(the imaginary)，再加上安德森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 時，提出用作說明的五塊基石：



1. 族景 (ethnoscapes)
2. 技景 (technoscapes)
3. 財景 (financescapes)
4. 媒景 (mediascapes)
5. 意景 (意理之景, ideoscapes)

這五「景」(landscape)沒有一景是跟傳播現象無關，它們的流動變遷加總成爲全球化今日想像的世界。<sup>(3)</sup>而阿不都賴特別以「族景」的觀念，說明今日人類學者的民族誌，應如何做到在 Clifford Geertz 所倡「厚描」之外還兼顧「異描」(thickness with a difference, 1996:55)。他先說了三個小故事：1988年初他與家人回到印度南部馬杜拉(Madurai)參觀民拿斯奇(Meenaski)廟的經過；阿根廷作家 Julio Cortazar 1984年出版的魔幻短篇故事〈砂礫之池中游泳〉；印度女導演奈兒 Mira Nair 84年拍的《印度酒館》。在這三個情景、報導媒介迥異的故事中，阿不都賴認爲它們提供了兩點共同的啓示：如何發覺離鄉之人展現他們想像世界的處所；今日各色人等的生命無法與再現的媒體分開，所以電影、小說、遊記都成爲民族誌的重要素材(1996:63-64)。他這裡所用的手法，簡言之，是在三個語言平面(遊記、小說、電影)中，看出改善民族誌寫作的兩個共通點。

第二個例子出自筆者在不同場合說明小作《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2001)的經驗。面對社會及新聞研究所的師生時，我曾兩度想把我書中主要三章所用到的理論，簡化成一個符合「理性模型」的樣式，因此我可以說我的經驗資料支持或否定了理論的預言。但是我發覺我不但無法這樣簡化，試圖簡化都使我感覺我損失了本書要傳遞最重要的訊息：我的父祖輩身歷異族統治的親身經驗。問題還不只是這樣，當我第三度要簡化時，我才發覺當寫書時，自以爲是在「理性的模型否認」典範影響下工作，結果我卻完成了一本更趨近「想像的意義探索」的書。小作一、二、三章中的模型，共享一個相似點：它們都是受到結構主義語言學聚合(符號之間表現出某種相似性，類似上文的「隱喻」關係)、

組合（以兩個符號在一句話中占有的位置來說，如果任兩個位置呈現某重形式上的接近關係，這兩個符號就表現出組合關係，類似上文的「轉喻」關係）觀念的影響；但是在不同的哲學家（第一章的 Paul Ricoeur）、文評家（第二章的 Homi Bhabha）、及史學家（第三章的 Hayden White）的想像中，相同的觀念幻化為各種不同的解釋架構，而我正是利用了不同的架構，以解決面對「文類」（genre）迥異的史料（善書、社論、遊記、小說）所產生的詮釋問題。相對於阿不都賴運作想像力的方式是從不同的文類中找到相似點，小作卻是從相同觀念在不同名家的運用中，得到詮釋不同文類的工具。

以上二例要強調的是，如果我們再死守著任一傳統的理論模型去研究傳播，或擴大來說，社會的真貌，我們就會像古代矢言走到海角天涯的航海家一樣，最大的努力只會送我們回到原點。在全球化的今日，小文主張我們應該在繼續光大「理性的模型否證」之餘，更要擁抱「想像的傳播探索」，而落實的第一步則可以從「家族相似性」觀念與傳播研究的接軌做起。

智慧藏

## 註釋

- (1) 推 Mead 之意，「同等效果」指的是對 B 的回應態度 A 有相同的理解並內化之。
- (2) 限於篇幅我無法在這裡進一步做剪裁兩者，以運作化一個實證主義型「理性傳播理論」的工作。不過我所謂的「實證主義型理論」，卻可以社會學者 George Homans (1982) 的「概括法則模型」(the covering-law model) 理解之。這一模型有三大主旨：
  - a. 一個現象的理論，意謂以命題來解釋這一現象。
  - b. 一個命題必須至少滿足兩個條件：
    - i. 它必須道出至少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 ii 它至少必須著手澄清這個關係到底是什麼。
  - c. 所謂解釋至少包含三種命題：
    - i 抽象層次最低的經驗命題。邏輯上當此一命題可以由下述的理論命題中推理得出時，它就是「得到了解釋」。所以所謂解釋是自成一演繹 (deductive) 的系統。
    - ii 至少有一個理論命題，而它的「理論性」源自邏輯上它無法自同一集合中的其他命題中推論得出。
    - iii 有中問命題 (或稱條件命題) 以澄清理論命題可以被運用的限制條件。

以實例來說，像「立法院次級問政團體能夠發揮集體力量的，必然是因為內部有高度信任感所致」是一經驗命題。提出「搭便車」(free-ride) 理論的 Mancur Olson (1965: 2) 的名言，則是理論命題：除非一個團體的成員很少，或除非有威嚇 (coercion) 或其他機制令個人為共同利益而行動，理性而自利的個人不會為了達成共同或團體的利益而獻身。而進一步說明這兩個「除非」條件中第一個條件的中間命題如下 (第二個條件是適用像國家這樣的大團體)：小團體之間的信任感由三個條件中產生—成員有限、對每一成員的背

景資料瞭若指掌、以及成員之間經常碰面 (North, 1992: 12)。透過中間命題，我們可以檢證「立法院次級問政團體」這一經驗命題，以建立相關的理論命題是否適用的結論。希望借用這一個長例，足以說明筆者所稱，傳播的研究應從「理性的模型否證」過渡到「想像的意義探索」，並沒有以後者代替前者之意。兩者應各擅其長讓百花齊放，只是在目前研究者也應該對「想像的意義探索」多加鼓吹。

- (3) 五「景」與傳播現象的密切關係可見諸 Rajagopal (2001) 的近著。



## 參考書目

- 方孝謙 (2001)。《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台北：巨流。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 London: Verso.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ker, G. P., & Hacker, P. M. S. (1980). *Wittgenstein: Understanding and meaning*.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mans, G. C. (1982).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3 (Summer): 285-292.
-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In Morris, C. W. (E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rris, P. (Ed.). (1994).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London: Edward Arnold.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jagopal, A. (2001). *Politics after television: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public in Ind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oloshinov,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oloshinov, V. N. (1976).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I. R. Titunik, Trans.).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ittgenstein, L.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Trans.).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Anti-)Global Age: Mead, Bakhtin, and Wittgenstein

Shiaw-Chian Fong\*

### Abstract

In the pre-global age, what is popular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ems to be a positivist-rational paradigm, which remains useful in guiding research judging from a model that combines ideas from both Mead and Bakhtin. This paradigm pivots upon the power of reason, a thinking style that emphasizes the causal relations among events located in time series. However, on the eve of the (anti-)global age, we would propose an imaginative framework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which draws upon the concept of "family resemblance" as expounded by Wittgenstein. Imagination stresses the ability to se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ings and events that are widely considered as disparate. The enhancement of this ability can be aided by the use of literary tropes such as metaphor and irony, which are in opposition, but also supplementary, to metonymy and synecdoche, the two tropes that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use of reason.

**Keywords:** gesture, inner words, family resemblance, similarity, contiguity

---

\*Shiaw-Chian Fo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ucha, Taipei.